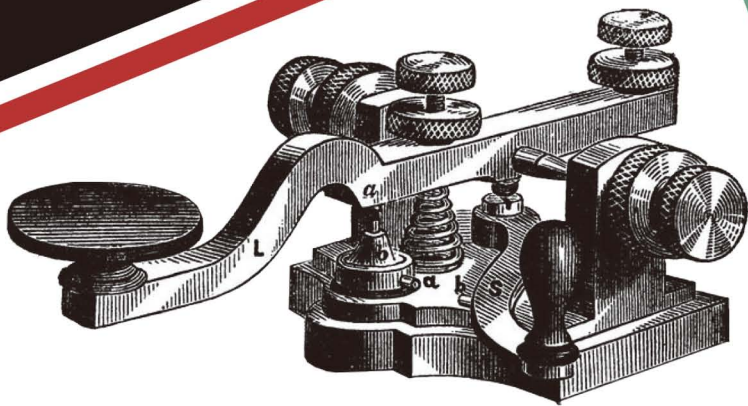


孙兴泉
孙修文 著

谍战上海滩



18 心敌打
年脏人入



 中国言实出版社

孙兴泉，1964年生，山东临沂人，现居北京。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家电网公司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小说、散文、诗歌作品近三百余篇(首)见诸报刊杂志。曾获中国电力文学奖。

孙修文，1940年生，山东青岛人，现居上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共上海地下斗争史研究中心理事。退休前在华东电业管理局任《华东电力工业史》副主编，编审。著有小说《梦断红楼》《血色黎明》《净土的呼唤》，传记《董竹君》《张权将军》《谍中情》等。曾获中国电力文学奖。



谍战上海滩

孙兴泉 著
孙修文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谍战上海滩 / 孙兴泉, 孙修文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21.8
ISBN 978-7-5171-3825-9

I . ①谍… II . ①孙… ②孙… III . ①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59750号

出版人 王昕朋
责任编辑 李昌鹏
责任校对 张国旗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6号院B座6层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hs.cn

E-mail: zgysch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1年9月第1版 2021年9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5.75印张
字 数 258千字
定 价 58.00元 ISBN 978-7-5171-3825-9

目 录

一、一九四九年元旦	002
二、巡捕房里的革命火种	015
三、来自底层的反抗	031
四、保卫周公馆	041
五、“金都事件”始末	052
六、工学运动轰轰烈烈	060
七、铲除新四军潜逃叛徒	083
八、币制改革七十天	110
九、暗度陈仓的蒋家政府	119
十、潜伏在敌人心脏	125
十一、黎明前夜的战斗	146
十二、永不消逝的电波	159
十三、兵变上海滩	169
十四、血色黎明	190
十五、保卫电厂捍光明	210
十六、迎接解放	234
参考文献	245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的上海。

外滩路一带，百老汇大厦，沙逊大厦，汇丰银行大楼，英国领事馆，一幢幢盎格鲁-撒克逊与新希腊式华丽贵族风格相融汇集，尤其在夜幕下，闪烁的霓虹灯在海风吹拂下轻轻摇曳，分外撩人。

上海经过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年时间的崛起，焕发着相当浓郁的大都市色彩。但 1946 年到 1949 年间，这座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之大成的远东第一大都市，正被阴郁的白色恐怖和战争气氛笼罩着。

就在这一时期，上海市地下党警察局工作委员会书记邵健领导 472 名地下党员，长期潜伏和战斗在敌人心脏，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而又有惊无险的谍战故事，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令人惊叹的是，潜伏在警察系统的地下组织鲜有牺牲，更无一人变节。无疑，这是一场高水平的较量，是令人叹服的忠诚，是多年以后仍然耐人寻味的一段往事。今天，在我们党一百周年诞辰之际，让我们重回上海滩，重新走一遍那身处黑暗、探求光明的道路，去重新认识那个我党隐蔽战线中赤胆忠心、智慧果敢而又铁血柔情的山东汉子吧。

一、一九四九年元旦

中国历史上颇有意味的1949年终于到来了。军事决战的战略性胜负，在白雪皑皑的淮海平原上已然成为定局。但是，以国共双方为主角的这部恢宏的历史剧的最后一幕的舞台，却注定要置立在上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曾经在此风云一时的蒋介石，也即将告别大陆。

前方战场上，解放军战士准备好了冲锋陷阵，而在另一个敌人看不见的隐蔽战线——无数地下党员也在紧锣密鼓，编织着扑灭所有法西斯政权幻梦的网，暗暗与国民党政府下着一场四两拨千斤的棋局。警察局是维护国民党当局利益的主要政治工具，所以说在这盘棋中，警委至关重要，上海市地下党警察局工作委员会（简称警委）书记邵健同志则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子。

一家“米店”的新年夜

一幢三层楼房坐落在迪化中路（今乌鲁木齐中路）93号，从1948年初春开始这里就在筹建米店，历时年余仍未开张营业。米店的老板邵健是个山东汉子，三十八九的岁数，将近一米九的个头，留有络腮胡须，一副标准的北方生意人的打扮。他为人憨厚，办事果断，说一不二。邵健的真正身份是上海市地下党警察局工作委员会书记，打入国民党警察系统的数百名中共地下党员都是在他的指挥下，在敌人心脏里开展战斗。

开米店只是作掩护，在此他建立了新的秘密联络站。而且，知道秘密据点的人很少，就连警委其他领导人，也只有部分人知道。于是，这里便成了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和警委主要负责人的秘密活动据点。

1949年的元旦前夕，上海与南京一样暗潮涌动、人心不宁。这些日子里邵健常常凌晨一两点钟才回到家里，有时整夜不归，妻子王秀珍知道丈夫在外边做什么，她总是等他回来才能入睡。她既为丈夫担惊受怕，又为自己有邵健这样一位好丈夫而感到自豪。她常常在孩子们入睡后，一个人坐在灯下回想与邵健相识、相恋及结为夫妻的日子，虽说很穷很苦很累，

但觉得苦中有乐有甜。他出身苦，但他有骨气，自小好学，在家乡私塾先生的指教下，他习字学文，成为村子里的文化人，他完全可以在乡下谋个体面的事干干。可是，他向往光明，追求真理，渴望革命。1927年初春，邵健因反抗地主逼债遭通缉，星夜逃出虎口。临走时，他说服地主的管家打开后院开仓放粮，并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罪名”。

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知道他的去向，更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但她仍然苦苦地等待着他。后来，得知他已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工作，她就来到了上海。

夜又深了，这是1948年的最后一个夜晚。门，轻轻地开了。王秀珍一看邵健回来，便疾步上前，看了看门外，把门锁上，松口气似的说：“你回来了……”两人怕惊醒了熟睡的孩子，蹑手蹑脚地来到小小的灶间，相依而坐。邵健道：“你跟着我受苦了，往后别再等我了。”

妻子道：“这些日子你吃不好，睡不好，我心里不是个滋味……”

“上海就要解放了，苦日子快熬到头了……”邵健没有说下去。妻子先是一惊，看了看门窗有没有关好，会意地说道：“是不是解放军要打进来了，上海要解放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邵健的脸上也洋溢着胜利即将到来的喜悦，但神情很快又变得沉重了。他叮嘱王秀珍：“‘字典’记得给我放好。”

“你放心吧，我在，‘字典’在！”

王秀珍不知道“字典”的意义，邵健在里面标注了很多，谁都看不懂。但她知道，邵健把这本字典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看着丈夫躺下，她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她知道邵健一定是做着跟上海解放事业相关的大事。在这个过程中，她知道他很艰难，而且就在这一夜，他肯定是得到了非常令人难过的消息……

是的，就在1948年12月30日，李白失踪了。李白电台被破获。这是国民党继破坏中共西安电台、北平电台之后的一次连续行动，叛徒——原北平电台的报务员瞿则明在长期的合作中，“认识”李白发出电码的指法特点。

1948年7月，国民党的测探网已经伸到了李白电台所在地的虹口，并且实行分区停电，以测量秘密电台所在的电波区域。上级曾决定李白电台暂停联络。那天的情报就是邵健派人送过去的。他让传话的人用暗语传给李白，说：“这阵子老鼠多得很，都盯着晚上夜宵的人。晓得把狗放在院

里，吓唬吓唬老鼠。”

但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展开，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需要急报中央。1948年8月，李白电台不得不重新开始工作。当时，从这部电台送出去的重要情报有辽沈战役时国民党青年军第207师及第208师一部分通过海运在葫芦岛、营口登陆增援东北战场，淮海战役时黄维、刘汝明、李延年等兵团由华中地区北上增援淮海战场，以及长江防务、江阴要塞、吴淞口设防等，是当时中央指挥作战所迫切需要的。

李白电台重新出现后，很快就被叛徒瞿则明捕捉到。李白电台发报的时间越来越长，发报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使瞿更坚信判断无误。1948年12月29日晚，当黄渡路107弄的看门人发现两个陌生人竖着耳朵在一户人家的门前探听时，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在瞿则明的帮助下，已经查清了电台的具体方位。据淞沪警备司令部当晚执行任务的人说，那天夜里，狗叫得很厉害，他们本想再埋伏几天，以李白电台为诱饵破获共产党的整个情报系统；但是那一夜的狗叫声使他们害怕，他们总觉得这狗叫声与李白电台的“报警系统”有关，于是临时决定当夜行动。

邵健得知李白失踪的消息，知道李白凶多吉少。让他内心更加惴惴不安的是，秦台（秦鸿钧）是不是也暴露了——胜利肯定不会遥远了，他不想看到战友们就这样一个个“失踪”而去。

上海 新年第一天

1949年到来了，上海的早晨，古老建筑物沿蜿蜒的黄浦江傲然矗立。在拱形的外白渡桥巨大的钢铁梁架下，凝重浑厚的黄浦江水与青灰色的苏州河水缓缓汇合，又缓缓地折向东去。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南京东路以南、福州路以北那条约200米长、旧称“望平街”的小马路上，已经人头攒动。这条街是上海赫赫有名的报业发源地。上海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申报》《新闻报》在这里起家；《时报》《神州日报》《民立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商报》等曾在这里驻足。报贩子在这里办起“派报行”，几乎垄断了所有报纸的发行。

报贩子们一个个盘腿就地而坐，双膝间摊放着数百、数千份的新报纸。在他们周围，是数十、数百个十岁大小的报童。一只只小手在人群中挥动，一张张染满污泥的脸孔闪着机灵，一声声尖尖脆脆小鸟般稚嫩的童

音泛起：“爷叔爷叔，今朝有啥新闻？”他们不识字。

元旦清晨，在刺骨的朔风中，外滩一带繁华的街道上早早就传来报童清脆的喊叫声：

卖报，卖报，三十八年元旦特大新闻！
中央报，中央报，蒋总统发表《新年文告》！
大公报，大公报，政府呼吁和谈有望！
老申报，老申报，和谈关键系于“共党”！
新闻报，新闻报……
看报，看报……

报童们的声声叫喊从各家报馆迅速播散开去，顷刻传遍全城。

街道上匆匆过往的行人纷纷从口袋里掏出钞票。他们中有穿长衫的职员、着西装的绅士、戴眼镜的先生、夹书本的学生、短打扮的黄包车夫，甚至有拎菜篮的娘姨……上海市民对于政权变更的敏感度为中国其他任何城市所不能比拟。

邵健疾步走在外滩路上，掏出钞票塞给报童，顺手拿了一份《申报》。报童应声喊道：“谢谢老板！”显然他是一副做生意的模样。半年前他曾把一家炒货店做到了流通南北货的程度。当年，中共地下党活动的许多开支，都是从这家“锦华炒货店”支取的。

外滩路附近几家大报馆的阅报栏前围着许多人。但见今天各大报纸的头版都在醒目的位置上刊登了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民国三十八年的元旦文告，其刊载的文章标题是：

总统发表元旦日文告
和战关键系于“共党”
宪法不能违反，国家必须独立完整
军队应有保障，人民维持生活自由

“全国同胞：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纪念日……”邵健把这些浏览了一遍。报上元旦社论的标题是《三十八年元旦献词》：“今日国内上下，皆昌言政治腐败，而究测纷纭，莫衷一是。兹且置贪污之弊勿论，但就通

常行政效率言之，施政者非必皆庸暗者流，奉行者未尝无廉饬之士，然而官民常失联系，上下难期合作，其故何欤？论者以为目下官场之通病，以泄沓为能事，以敷衍为手段，但知维护体面，不暇勤恤民隐，实为造成窳劣现象之总因。”

“蒋政府看似终于反思了……”邵健一面走一面想着，而这种反思已经救不了这一腐朽政权了！他紧走了两步，时刻都警醒着是否有人盯上自己，继续拿出一个商人的表情和步履，假装去探听一下开了春有什么生意好做。

走过英国领事馆时，他不禁环顾了一下四周。邵健知道，英国领事馆附近，在竖有“民生轮船公司”招牌下的一幢精致古老的建筑物里，上海市政府正在召开每年一度的新年团拜会。建筑物外沿江的马路上停放着各种各样新式、老式的汽车。上午8时之后，国民党驻上海的党、政、军、宪、警等各方的头面人物陆陆续续来到这里。这天是周末。在这幢建筑物里，与往年团拜会相比，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与会者先后到达，在门口签到，然后笑容满面步入大厅，远远地大声招呼，称兄道弟，握手抱拳，说着“恭喜恭喜，发财发财”，在宁静祥和的气氛之中，似乎无人感觉这将是国民党建立民国以来受打击最为惨重的一年。

邵健向一个秘密据点走去。一路上，各种听闻让他这个“生意人”深深感受到，上海市民各种惶惶的猜测、疑问乃至谣言，滚雪团似的随着这篇元旦文告越滚越大、越传越神。上海自1937年“八一三”抗战至今，十余年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事。如今，上海可能再次成为战场，而我们这些隐蔽战线上的战士，又应该如何去完成历史使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上午9时，上海市政府的团拜活动正式开始。市政府秘书长陈良先起身向与会者拍了拍手掌，然后走到会场的前边。他代表市政府向全体来宾致意，祝愿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康康泰泰。讲话中没有提及任何政治话题。与会者注意到市长吴国桢和元旦前刚刚卸任的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没有出席今天的团拜会。但是，人们很快又都忽略了这个问题。他们去哪儿了呢？

团拜会上，有一位英俊的年轻军官——段仲宇。元旦上午，他很早就离开家，赴上海市政府在外滩路举行的新年团拜会。不同的是，他的哥哥段伯宇独自在自己的屋里休息，静静地收听中共电台广播的毛泽东的新年献词。这篇献词的标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繁华的大上海另一个隐秘的角落里，此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也正在主持召开一个秘密会议——迎接上海解放的会议。此时的中共上海地下党已经拥有党员 8000 余人，并建有党的外围组织“工协”“职协”“教协”“新青联”“民主军警联”等，形成了有广大工人、学生、职员、店员等各阶层人士组成的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邵健作为警委书记，汇报了 470 余名警察地下党员和 2000 名外围组织成员及进步分子的情况，刘晓对警委的工作十分肯定，专门让邵健再次做了长期隐蔽和单线联系的经验介绍。

段氏兄弟

上海北站附近，宝山路宝昌路口的三角地段有一座颇为醒目的三层浅色洋房。元旦前两个月，这座始终空着的建筑的二层楼搬进了一户人家。这户人家虽然搬来的时间不长，但邵健在中共地下工作者田云樵同志的引荐下，已经两次前来拜访，并和这栋房子的新主人产生了某种默契。

这是一个大家庭。老先生是第一批同盟会成员。他虽身着长袍马褂，但笔挺的身板以及儒雅而果敢的言谈举止却又令人感觉到某种训练有素的旧式军人的风范。老太太和他年纪相仿，操着河北蠡县口音，慈眉善目，仪态端庄。

老人的两个儿子，长子段伯宇和次子段仲宇。他们兄弟二人为上海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后话。其中一位在九个月后登上了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是的，就是段伯宇。

先说这两个儿子身高逾一米八，相貌英俊，气宇轩昂。两兄弟穿一式美国黄呢将军军服，佩挂一颗星的国民党少将军衔。长子段伯宇是总统府军务局第四科（军事情报）少将高级参谋科长，也是人们常说的蒋介石侍从室专管军事情报的侍从武官；次子段仲宇是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的高级军事参谋，两个月前刚刚履职国民党联勤总部上海港口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并兼任铁路两路（京沪、沪杭）军运指挥部总指挥。

如果细看，两兄弟之间也有一些不同。哥哥段伯宇今年四十岁，也许因为是长子，神态语气颇为稳重，尤其有一种近乎拙朴的冷峻与坚定。在他干净利落的短平头下是一张线条粗犷、神态平和的面孔，肤色却有些苍白，两颊在午后有着淡淡的潮红。一个月前，南京中央医院刚刚诊断他患

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为此，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才同意他在党国危急当头赴沪离职养病。他在元旦前几天刚到上海，由于身体状况不佳，一直不大出门。他的卧室就在这幢碉堡式洋楼的最顶头，那是一间类似书房的屋子，三面有透明的玻璃封闭，一年四季都充满阳光，有享受日光浴的味道。

弟弟段仲宇小哥哥五岁，在家中他孝敬父母、尊敬哥嫂、爱护弟妹、疼爱侄儿侄女，十分细致谦和。由于战争，十余年间全家辗转各地，河北、湖南，重庆、南京、上海，他代替哥哥担负起了这个大家庭的重担。也许因为身体健康，他看起来比哥哥更英武帅气。抗战期间，段仲宇曾随美国驻华最高军事长官史迪威去滇缅战场，在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部任上校副处长，专管后勤补给运输。1946年，他随何应钦去美国纽约，在长岛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服务，负责国内军事情报业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他又曾是蒋介石侍从室极少数侍从中的一员。这些履历使得段仲宇在国民党高层官员中颇有影响。因此，在一些人看来，段仲宇轩昂的气质中又带有几分清傲。

元旦这天一早，当段仲宇赴上海市政府在外滩路举行的新年团拜会时，段伯宇独自在自己的屋里休息，收听了中共电台广播的毛泽东的新年献词：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

远、察哈尔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

临近中午的时候，家里的阿姨悄悄禀报：“邵先生来了，给太太送来一些河北过年的小吃。”段太太十分喜爱这位山东小伙儿，一直挽留他在家吃饺子。小坐了一会儿，段伯宇穿戴好出门的军便装，跟母亲告辞说：“我和邵先生出去转一转，顺便在外面吃。”

他们出门招手叫了两辆黄包车。与宝山路并行的四川北路不到中午便已热闹起来。古老的有轨电车伴着叮叮当当的铃声在狭窄的街面上来往。与它并行跑动的是各种三轮车、人力车，以及大小色彩斑斓的外国小汽车。熙熙攘攘的街面与硝烟味道浓郁的南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今天，家家店铺的门前都挂上了一面小旗。因为今年是中华民国实行“宪政”的第一年，政府要求在新年第一天，都必须挂上色彩鲜艳的小旗子。

经邵健周密安排，段伯宇与中共重要领导人约好了见面的地点，时间就在元旦这一天。为了减少中间参与者，邵健亲自保护着段伯宇的安全。确信一路上没有“尾巴”后，他在饭店门口摘下帽子又戴上，以此表示安全（如果摘掉拿在手里则为有情况），段伯宇便上了楼。

在约见的饭店二楼右边一处僻静的角落里，已经先到了一位身躯伟岸、质朴沉着、身着长袍的客人，他是中共上海局地下工作负责人张执一。

二人相见，落座。张执一说：“这个地方好谈话，但也不能久待。一会儿，我给你介绍一位新的同志。”正说着，一位教授模样的小个子中年人向他们走过来。他穿着一身整齐的西装，打着漂亮的领带，文雅的脸庞上带着温和的微笑。

张执一介绍说：“这是李正文同志，上海震旦大学的教授。我得先走，你们俩好好谈谈。”

段伯宇握着李正文的手，说：“李先生，我离开党已经多年，很多情况都很陌生，今后的工作请你多指点。”李正文说：“伯宇，不要称我李先生，就叫我正文。我是教书的，对于军事一窍不通，今后做工作主要还是得听你的，遇事我们一块儿商量吧！”

在这里，为什么要给段氏兄弟写下这浓墨的一笔，是因为在解放南京与上海策反国民党军起义的过程中，他们联合社会知名人士、进步人士和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同志，又凭借段仲宇手中的军事权力，为解放南京和上海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南京 最后的总统府

不得不说到南京。这也是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的最后一个新年了。此时，总统府的早餐桌上，蒋介石示意侍从打开收音机。

这里是 BKM 中央广播电台。

BKM——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BKM！这是一个陌生的电台呼号；他凝神细听，BKM！他记起，1949年元旦是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将原先的国际呼号“XKM”改为“BKM”的日子。由于中国已跻身国际“四强”行列，1947年10月2日在美国大西洋城召开的国际无线电会议决定：将中国无线电台呼号的首写字母“X”升格为“B”，新呼号从1949年1月1日起实行。消息传来，蒋介石十分高兴，特别嘉奖中央广播新闻处处长、中央广播电台台长吴道一。

七年前，也是元旦，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表了有中国在内的26个国

家签署的《联合国共同宣言》。宣言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签署。当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和中国代表宋子文率先签名之后，其余 22 国便按照国名的英文字母顺序签字。这一仪式标志中国已赢得“四强”之国际地位。之后，1 月 3 日，蒋介石由罗斯福提议被正式推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肩负起中国、泰国、越南、缅甸地区联军总指挥之职。

然而，今天的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已成为一座濒临战火边缘的危城。自 1948 年 11 月初淮海战役爆发之日起，难民的洪流冲破了京沪、沪杭、浙赣以及沪台、沪港一切陆海空交通线。1948 年 11 月 7 日，正好是周日，美国驻华武官乘飞机在徐州外围上空巡视，目睹“国军”溃败；回京下机，武官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发出撤走京沪侨民的指令，并让美联社发出这一重大消息。

1948 年 11 月 30 日下午，南京的逃难潮达到顶峰。当日下午 2 时，总统府内召开五院秘书长会议。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在会上向各院秘书长宣布“假使南京沦陷，应该如何如何的应变措施”，据说吴鼎昌此举授意于总统府内一位高级幕僚。尽管这位高级幕僚后来受到蒋介石严厉的训斥，但是消息已传出，整个南京当即便骚动起来。南京下关火车站变成了行李的山峰、人的海洋，所有月台全部被塞满。

最为敏感的海上也骚动起来。当日下午 3 时，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得知南京五院秘书长会议的消息之后，焦灼、徘徊。1948 年 12 月 2 日，上海《大公报》刊发了来自宜兴的消息：2 日当天，有百余辆新型小汽车从南京方向经宜兴往上海驶来。如此巨大的车群鱼贯而过，这在宜兴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引得公路旁的乡下人成群结队地看热闹。

蒋介石几乎带着仇恨反感那些纷纷逃离南京、在“国难”当头作“鸟兽散”的政府要人。他认为这与 1937 年国民政府迫于日本的侵略向后方撤离完全不一样，这是一种耻辱。他恨他的宿敌共产党，更仇恨那些躲藏在己方内部只顾个人利益、将他轻易抛弃的蠹虫。

南京陷于共产党之手只是时间问题，他十分清楚当时的处境：下野已成定局，而南京只是一具徒有“首都”虚名的空壳。

此时，邵健手中正得到一份可靠的情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搬迁！他迂回了几条街道，与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见了面，把这一情报转交给张书记。

情报称：电台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发有一张八开大小的表格，上面印有四条“疏散志愿”以“供君选择”：第一，自愿疏散，发六个月工资；第二，调下属地方电台工作，发给搬迁费；第三，去台湾，有疏散船可坐；第四，留京工作。还有，行政院资源委员会的拆迁工作也正在进行。

张承宗对邵健说：“我得到密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执政主张和谈，但是要知道，蒋不会真正放弃负隅顽抗，我们要做好接应上海解放的各种准备！”邵健连连点头，又向张书记汇报了在警委地下系统开展形势和气节教育的具体做法。张承宗肯定说：“很好，你把毛主席的新年献词抄写成‘针头小楷’，便于发散。”

1948年11月11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临时会议上，“文胆”陈布雷（蒋介石二十二年的秘书）一反往日的谨慎，向蒋介石进“忠谏”，遭到斥骂。两天后，他在自己的湖南路宅邸自杀身亡。没有人知道陈布雷近日都向蒋介石说过些什么。

多年以后有国民党高级官员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日中午离会之后，陈布雷的面色十分苍白。午餐席上，他情绪激动地说出这样一番话：“任何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首先是审时度势。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可是胜券却操在北伐军手里，能得定天下，势也。抗战胜利以后，将骄兵逸。8月军事会议之后，蒋公对宋希濂、杜聿明、黄维等高级将领都有安排，可是他们还是偕妻携子到杭州旅行，流连忘返。蒋公发火，把他们赶上前线。你们想，这样的仗怎么打得下去？”

十天后，徐蚌前线形势恶变，80万“国军”相继陷入困境，黄百韬战死在碾庄圩。据第64军突围回来的人说，1948年11月22日下午突围之前，黄百韬对第64军军长刘镇湘说：“我年老了，又多病，做俘虏我走不动，而且难为情。我牺牲以后，可使别人还知道有忠心耿耿的国民党人，或可使那些醉生梦死的人醒悟过来，国民党或许还有希望……”

陈布雷、黄百韬死后，国民党政府政治、军事形势依旧每况愈下，经济形势也因11月政府币制改革的最终失败而崩溃。为此，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内阁集体辞职。

1948年12月20日，孙科宣布他的新内阁组阁完成。在此之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已经表明他的坚决立场，认为蒋介石下野已成必要之举。蒋介石似已走入穷途末路。张群、吴忠信代表蒋介石去见副总统李宗仁，正式就蒋介石下野问题进行初步磋商。经过两次会谈，达成非正式的